

李澤厚與中國當代思想的萌芽

■ 梁燕城

本刊總編輯

李澤厚去世，使我們懷念這位中國改革後興起的思想家，改革開放剛開始，1979年他出版哲學研究重要作品《批判哲學的批判》，深入探討康德的認識論、倫理學、美學和目的論，將真、善、美帶入中國哲學的論域，震驚海外學術界，想不到文革剛過，中國竟有如此有份量的哲學學術作品。

他與海外大部份中國學者對康德的解釋不同，將康德哲學歸向由實踐方向去分析，指出「實踐不僅具有普遍性，而且有觀實性的優點，認識的能動性根源於實踐的能動性。工藝史、認識論與主客體的區分。」他的思路重生活的實踐，不同新儒學派講道德心性的實踐。由此突顯了中國大陸學者的思路，因馬克思主義的氛圍，以生活實踐為依歸，由之建立人認知的基礎。他亦開創了中國大陸學者不同的哲學新領域。

他特別提出使用工具是人與動物的基本區分：「人類實踐活動以原始工藝(製造工具)為始端。使用工具、製造工具的人類勞動打破了動物生活活動的狹隘性、固定性、特殊性，對現實世界在客觀上造成了大量的、多樣的因果聯繫，這才是因果觀念和範疇的原始基礎。構架、理想模型對認識有重大作用。」他由此說明人和物的區分，人從使用工具展示其社會性及對自然的改造，建立了主客體的區分：「而動物是不可能有人所特有的認識能動性的。以

使用工具、製造工具的活動為特徵的原始人類的實踐，突破了這個限制。它不再是原來動物性的既定的族類生活活動，而是在特定的社會結構的制約下，通過對客觀自然界種種事物日益廣泛和深入的掌握，從而具有無限發展可能地去支配自然、改造自然的客觀性的現實活動。這就與動物適應環境的本能性的生存活動有了根本的區別。在這裡，主客體之分才有真正意義。」這是李澤厚哲學的核心思維，我曾問他如何在文革期研究康德，有如此創新的理解，他說是躲在綿被中，用小手電筒讀書，有空時寫下論文，改革後即出版。

我第一次認識李澤厚是在1982年夏威夷大學的朱子學會議，我那年剛到夏威夷讀博士，跟從成中英老師，之後也聽安樂哲及阿部正雄老師的課。在開學前即飛檀島參加這大會，這次大會是第一次中國大陸派中國哲學學者出國開會，有馮友蘭、任繼愈、李澤厚、張立文等，美國有陳榮捷、成中英、杜維明、傅偉勳、秦家懿等，台灣有羅光主教、蔡仁厚、高明、韋政通等，還有日本名學者岡田武彥及支枝龍太郎，都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哲學界一時之俊彥，還有一些研究中國思想的年青美國學人。

在會中我最高興是見到敬仰的馮友蘭，我在中四(即高中一)已讀馮老師的《中國哲學史》，第一次全面了解中國哲學，因而到中

五有基礎可讀得懂唐君毅的《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》，心中很佩服馮老師，這次第一次見面，十分欣喜，他在參觀夏大哲學系時，有一簡短發言，可惜聽不清楚他的普通話口音，大概是討論理在氣中的問題。後來在慕尼黑的中國哲學會議，認識他在清華大學的弟子羊滌生教授，得知馮友蘭那時寫《中國哲學史新編七冊》，馮友蘭去世前發論文《中國哲學的底蘊精神——（中國哲學史新編總結）》，提出張載之言：「有象斯有對，對必反其為；有反斯有仇，仇必和而解。」（《正蒙·太和篇》），他指出過去革命鬥爭，是「有反斯有仇」，自然會講「仇必仇到底」，但至今建國應該轉向，回到張橫渠的「仇必和而解」，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世界哲學的未來。馮友蘭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，展開新思想路向，就是「仇必和而解」，重建中國文化和諧之路。

大會中認識張立文教授，他贈我《朱熹思想研究》一書，學術性甚高，是文革後有水準作品，他提出朱子的邏輯結構，進路與海外新儒學派不同，我博士論文寫到朱熹時，也參考其說，與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比較。他後來寫《和合學概論——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》，是馮友蘭和解哲學之路，他是第一位發展新一代和諧哲學之思想家，從易學思路化解人類共同面臨的五大衝突：人與自然、社會、人際、心靈、文明等衝突。其體系具大師級視野。

大會用英語舉行，新儒學牟宗三學派的掌門大師兄蔡仁厚，請我坐在他旁邊翻譯中文，又因李澤厚在大會提到不同意牟宗三老師的思想，蔡老師請我將其英語論文翻中文，以便回答。那時牟宗三老師重建儒學，由康德哲學轉向道德形而上學，名氣在中國哲學界如日中天，我們這些弟子們稱之為天下第一劍。然而李澤厚卻挑戰儒學盟主，提出不同的對康德解釋，以生活實踐路向和美學目的論，打開另一

維度的中國哲學思路。蔡仁厚的回應只是守住老師立場，但李澤厚已開拓中國大陸的儒學傳承，及融會西方思想的路。

1994年李澤厚與我對話時指出：「最高的美學境界就不是感官快樂的問題，而是一種宗教情感或者接近宗教境界的情感，與天地交流，我與天地統一。」（見《文化中國》第二期）他提到對真理的信念是什麼時說：「我認為是情感。人生的意義在於情感。包括人與上帝的這種關係，最後還是一種情感的問題，不是認識的關係。……所以我說天人合一，歸結為情感問題。」他的天人合一論是美學和情感性的，不同牟宗三的道德理性。他指出：「我與新儒家不同。我是以情與具體的生活為本。他們是以心性為本，我認為心性為本容易建構一個外在的權力知識結構造成對人的壓迫。」

他又說中國吸收西方的科學科技不難，但「中國人比較難於接受，而應該去了解或吸收的，就是宗教方面的文化例如東正教中的苦難觀念，和其神秘經驗中所追尋的靈性黑夜境界。這是一種很崇高的精神境界。中國沒有從希臘古典悲劇到杜斯妥也夫斯基這種種作品。」這是對西方精神文化的精闢見地，其深度在90年代是少見的。

李澤厚的實踐哲學與情感美學，和張立文的和合論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，建立了改革後的思想體系，成為中國新時代文化復興的萌芽。到今天中國建國初步成功，恢復文化自信，當今中國文化的重建，都有實踐論及和諧論的思路，用中國文化強調的天人合一之道體論言之，我稱當代中國思想方向，為建立本體—實踐論，本體—和諧論。指從本體開顯實踐之道，包括道德、生活及社會實踐，由本體之道帶來和諧，又由和諧的實踐，回頭開顯本體，引出新的實踐與和諧，而成生生不息的進程。